

序

在香港的歷史上，能夠富過三代、顯赫一時的家族不少，但能憑宗教、政治網絡與資本崛起壯大，且家族成員取得歷史上多個第一，包括香港第一位華人牧師、香港第一位華人立法局議員、第一位不靠科舉而出任滿清高官、第一位同時擁有律師及醫生資格的華人、第一位擁有英國律師資格的秀才、第一位獲大英皇室爵士頭銜的華人、第一位出任中國外交部長的香港人、第一宗子女狀告母親的爭產官司等，便只有何福堂家族而已。

何福堂家族的先輩，是英國倫敦傳教會在十九世紀初到華傳教時率先皈依的一群，相信因此受到傳教士的信任與重用，宗教網絡可說是其家族崛起的支點，讓他們在接着洋人東來、西學東漸的浪潮中，獨得風氣之先。再加上不少家族成員才能出眾，在外國著名學府取得專業資格，中英語流暢，成為中西方接觸初期時極缺的人才，故不但在香港這個殖民地獲吸納，踏上政壇，成為華人代表，就是在中華大地亦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指點江山。

若說何福堂家族的第一二代是香港上層社會最矚目的新星，但三代後他們卻彷彿失去所有光芒，不再受社會注視或政府重用，嗣後世代則幾乎一片空白，隱匿在人群之中。時至今日，恐怕知曉這個家族故事的人已寥寥無幾，甚至將之與何東家族混淆，誤以為何

福堂是何東胞弟、何鴻燊的祖父何福的別稱。其實兩個家族毫無親屬關係，血脈與宗教信仰亦差異巨大——雖然兩家都曾在香港歷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書寫了自己的傳奇。

到底宗教、金錢與政治資本如何令何福堂家族拔地而起，家族成員在香港與內地盡佔風光？第三代以後的成員若論學識才幹，其實不遜其父輩，又是甚麼原因令他們韜光斂彩，不再走在前台與人爭鋒？當然家族周期有其成敗起伏，就如星明星黯是必然之事，但何福堂家族特別之處，是它的興衰緊扣着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時代變局，故上升時鋒芒畢露，消失時卻突然而急促。此外，不少家族成員或因際遇或因個人選擇，故經歷了與別不同的獨特人生，他們的故事亦值得讀者細思。

本書採取多世代綜合分析方法，檢視不同形式的資本，以及政治環境變遷如何左右家族的起落跌宕。誠然，要將何福堂家族數代人的發展說清楚殊非易事，特別是這個家族在港英政府管治、洋務運動、孫中山革命、民國政府、南北分裂等重大歷史上，均參演了不少角色，故相關的文獻可謂浩瀚如海，我們必須蒐集充足及詳實的資料，研究家族前進過程與遭遇，同時又要作出篩選，在互相矛盾或殘缺疏漏的資料中，找出較可能的推論。此外，亦要簡而精要地將香港、中華大地，以及世界歷史的脈絡與家族發展一起鋪陳，再加上信仰、政治、營商與投資等角度分析，希望能不偏不倚地還原這個家族的故事。

儘管挑戰極大，期間遇上問題頗多，但最終能順利完成，實乃獲得各界友好及機構鼎力協助所致，在此謹向他們致以最衷心感謝。

首先，要感謝我們家族企業研究團隊黃紹倫教授、孫文彬博士、周文港博士、許楨博士、王國璋博士及閻靖靖博士，儘管過去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們鮮能如過去般聚首談天論學，但幸好在科技幫助下，大家仍能坦誠分享、交流見解、互相鼓勵，實乃研究道路上的重要助力，令人感動。

同樣地，亦要向前研究助理梁凱淇小姐，現任研究助理李明珠小姐和行政主任俞亦彤小姐表示謝忱，她們為了蒐集資料，要不斷在各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之間來回奔走，經常對着那些老舊的報紙或微縮片，逐點逐滴地篩選出有用的資料。正因她們耐心的工作和努力，本書的內容才能如此充實。

當然，亦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歷史檔案館等提供資料，給予支援和協助，使本研究可克服種種困難，達至今天的成果。至於香港真光中學及鄭文慧副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及馬志民牧師、梁延敬先生等，慷慨提供多幅何福堂家族的珍貴圖片，更令本書生色不少，亦特此鳴謝。

最後，要向太太李潔萍表示衷心感謝，她是第一位閱讀文稿之人，並多次協助校對及給予不少建言，當然，她大小家事一手抓，讓我不用操心，並在我身心疲累時為我打氣，更令這項研究得以順利展開、維持和最終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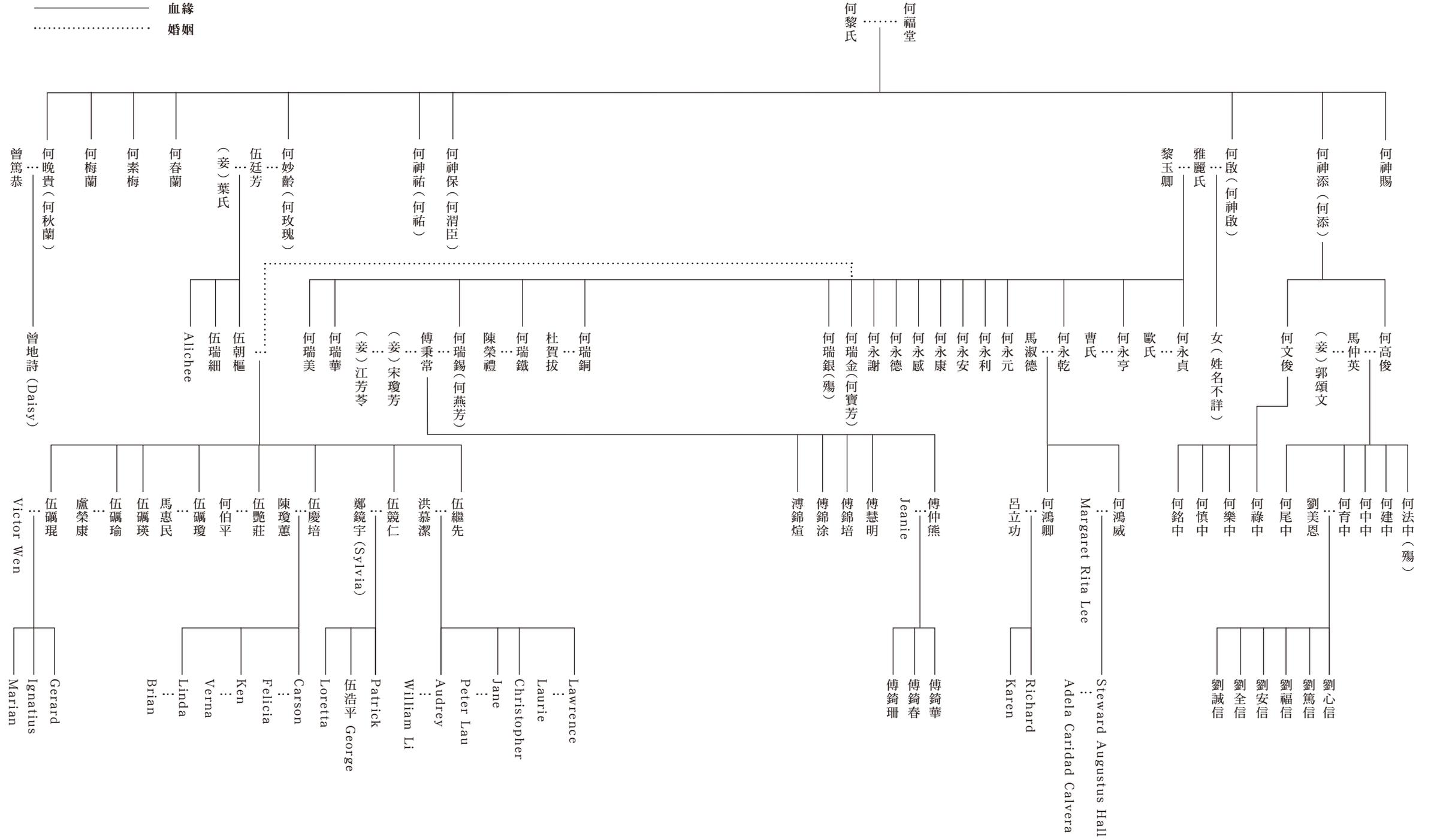
雖然得到各方友好和機構的大力幫助，但仍因沒法完全掌握政局的急速轉變、歷史的曲折漫長、企業的興衰傳承和人生的順逆起落而出現一些糠粃錯漏，對於某些疑而未決、模糊不清的地方，雖

努力求證，但仍沒法做到完美無瑕，這雖是不願看見的，卻很難避免，但望讀者有以教我，指正批評，讓研究可以做得更扎實、更豐富。如對本書有任何意見，請致函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或電郵 vzheng@cuhk.edu.hk 聯絡。

鄭宏泰

家族世系圖 (已知者)

—— 血緣
 婚姻



目錄

第 一 章	文明碰撞 中西時局變遷下的危與機	1
第 二 章	華人牧師 何福堂的傳道不忘生財	2 1
第 三 章	白頭相守 何妙齡與伍廷芳的同進共退	5 1
第 四 章	醉心論政 何啟的醫法兩專和清風兩袖	9 1
第 五 章	兄弟殊途 何啟諸昆仲的各有所謀與不同際遇	1 2 7
第 六 章	迷失婚姻 何晚貴與曾篤恭的夢幻感情	1 6 1
第 七 章	專注行醫 何高俊的一生懸壺濟世	1 9 1
第 八 章	外交長才 伍朝樞與傅秉常的連襟同科	2 1 3
第 九 章	轉換舞台 何永乾諸兄弟的闖蕩上海	2 4 7
第 十 章	女中英豪 何中中的一生奉獻教育	2 7 1
第 十 一 章	一心從商 伍繼先與何鴻威等人的操奇計贏	2 9 5
第 十 二 章	變中尋機 家族起落興替與時勢轉變的思考	3 2 7
參考資料		3 4 1
序		iii
家族世系圖		vi

中西時局變遷下的危與機

引言

不同文明或國家的接觸交往，既帶來機會，亦產生挑戰，中華大地與歐洲之間的往來互動亦是如此。遠的不說，十九世紀當大英帝國全面掌控包括印度、緬甸、斯里蘭卡在內在的南亞等地後，又進一步把勢力伸展至東南亞，以及被歐洲人視為遠東的東方大國——中國，並因當時的滿清皇朝覺得自身可以自給自足，不假外求，加上對商業貿易一向不太重視，所以寧可閉關鎖國，不願與之接觸，加強交往，惟這種反應卻引來熱切渴望拓殖通商者的不滿，產生了激烈衝突，最後導致對方不惜採取武力、兵戎相見。至於這個文明碰撞的過程，既令無數家族顛沛流離，走向消亡，亦令不少家族可以乘勢而起，書寫傳奇，本書深入探討的家族，正是後者的佼佼者。

對文明碰撞問題闡述得清楚透徹，在國際社會備受關注的，首推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他的系統分析指出，在急速變遷的社會中，不同國家或文明（文化）之間，由於宗教、制度、價值等差異，很難不因各為利益而發生衝突（Huntington, 2011）。當前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衝突頻頻，甚至衍生極端恐怖襲擊等，便屬常常被引用的例子。若放在十九世紀的國際形勢下，滿清與英國或者是歐美列強之間，在不同層面的差異，最終激化為連串衝突，其中英國商人在華進行鴉片走私活動時趨猖獗，受到滿清打擊後則不惜發起戰爭，然後在大敗清兵後迫令對方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則迫使滿清不得不打開國門——哪怕那時內心極不情願，彼此間充滿懷疑猜忌，互信了解十分薄弱。正因雙方文明存在着巨大隔閡和差異，互信和了解極度不足，如何促進溝通，提升互信，無疑乃有意進一步發展雙邊及多邊關係

的關鍵所在，那些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扮演重要角色者，自然能夠突圍而出，甚至可成為造王者。

文明的邊界與跨越

文明或者具體地說文化雖屬肉眼看不到且十分抽象的東西，但卻十分具體地形塑或決定了社會運作邏輯、制度設計及社會關係，同時亦左右了人民的生活習慣、行為模式與道德倫理等等。退一步看，文化的孕育與形塑，與自然氣候、山川地理及宗教信仰緊密相連，亦互相配合。例如位處熱帶氣候與寒帶氣候者，必然有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行為準則，亦會孕育不同宗教信仰。按此類推，位處遼闊平原者，必然與處於高山峻嶺或丘陵海島者，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信仰模式；位處四季如春、土壤肥沃地方者，又必然與位處荒涼沙漠、氣候極端者，呈現不同運作邏輯，產生不同信仰與文化。

具體地說，因為地球東西南北經緯及海陸山川河流走向等不同，造成了宏觀自然生活環境的差異，因此使人類在這個地球村上有了為着應對各自地理氣候環境，締造各自生活空間的不同生活習慣、社會制度、行為模式、價值信仰、工作倫理等等。若只集中於被視為世界五大文明古國的文明邊界與特點看，則不難發現，由於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和氣候不同，因此發展出不同文化與社會制度。舉例說，位處巴爾幹半島，面向愛琴海，具地中海氣候的古希臘，所孕育的文明，便呈現了城邦林立、各有競爭的特點。位處北非乾旱大陸，面向地中海，受尼羅河哺育的古埃及，又呈現了社會制度、建築、曆法及文字等不同風格。其他如位處西亞美索不達米

亞兩河（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巴比倫，位於南亞次大陸恆河流域降雨充裕的印度，以及位於東亞黃河和長江流域的中國，均因彼此截然不同的地理與氣候，孕育了各有特色的制度、文化和思想藝術。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人類社會沒有踏上現代道路之前，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間的差異，其實不過是各自各精彩而已，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來，既甚少出現跨文化的接觸交往，所衍生的問題亦甚有局限，衝擊自然不會太大。事實上，受山川海洋沙漠等天然環境阻隔，交通工具則十分落後影響，不同文化的一些接觸交往，往往只是零星分散、點到即止，接觸度亦十分有限，就以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接觸交往為例，早在漢朝時便有張騫通西域，唐朝時有玄奘、法顯到印度取經，元朝時更有馬可孛羅（Macro Polo）自歐東來，這些跨文化接觸，雖曾吸引社會注視，產生影響，但論衝擊的層面或規模，則並不十分巨大。

然而，自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間接觸交往的深度、廣度、頻度、程度等，則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巨大變化，山川海洋不再成為阻隔，文明文化的邊界可以輕易跨越。簡單地說，由於歐洲率先孕育了改變人類千百年生活的科學技術，尤其掀起了全球航行、啟動了工業革命，以及由此引來的連串其他劃時代如政治制度、經濟思想及社會價值觀念等變遷（參考另一節討論），令其儘管幅員人口不多，卻迅速崛起成為世界霸權，主導世界秩序（郭少棠，1993），不但掀起了全球化的浪潮，亦展開了開疆拓殖的競爭，令那些仍停留在傳統社會階段的國家與民族，在入侵者面前顯得如摧枯拉朽般不堪一擊，因此只能淪為歐洲強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王曾才，1989）。

在那個前所未見的重大歷史巨變時期，無數仍停留在傳統社會的國家或民族被征服，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自然地理為疆域的阻隔被克服，但以文明、文化差異為樊籬的阻隔則並沒因此被消弭泯滅，所以仍有不少因為語言、信仰、制度及生活習慣等差異的障礙難以克服，需要從跨文化接觸交往中逐步消除隔閡，增加彼此了解，建立互信與共融。另一方面，某些能夠抗拒侵略的國家或民族，在與歐西文明的接觸碰撞中，逐步明白到自身與對方的強弱優劣，因而作出調適與吸收，最終因為能夠從取長補短中提升本身的發展動力和文化的內涵，既能擺脫落後捱打的局面，亦能如歐西國家般走向現代化。

與同屬世界文明古國又人口眾多的印度相比，中華文明在與歐西現代強國接觸交往中，雖沒像印度般淪為殖民地，但亦經歷了一個十分崎嶇曲折、極為艱險的歷程。簡單來說，當歐西文明已經發展成現代化強國，並且隨着其殖民擴張支配了全球秩序時，以歐洲為中心，且被稱為「遠東」的中國，初期不但不受侵擾，更能從國際貿易中獲得「出超」的成果，惟那個局面卻因英國商人輸入鴉片而逆轉，最後是滿清皇朝因不能再容忍鴉片毒害人民，採取強硬手段禁止鴉片走私入口，傷及英國利益，於是觸發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然後有了戰場中敗北的不平等條約，出現一個被一代名臣李鴻章形容為「千年未見大變局」。

雖然地理阻隔被跨越，中華大地不少地方淪為歐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文化差異所形成的阻隔則仍然明顯。一個前所未見的

特殊現象是，大量洋人、洋貨夾雜着洋教、洋風等等湧到，所到之處更可謂望風披靡，而那些能夠溝通華洋，減少文化及語言等阻隔者，一時間成為炙手可熱的「搶手」人物，令社會出現了一個能中能洋、亦東亦西的特殊群體，蔚為奇觀。

宗教的傳播與挑戰

宗教中的神（崇拜對象）——社會共同持有的一套信仰和慣例，並具有引導人們相信存在着某種神聖超自然王國的思想——在法國社會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眼中，只不過是經過改裝和用符號來表達的社會。換言之，涂爾幹認為，人們崇拜的神，只不過是他們自己的社會。他進而指出，一切宗教都對神聖和世俗加以區分，藉此提升對神的崇拜與敬仰，因此能夠達至維持整體社會穩定、團結與持續發展的目的。

人類在地球村上的足跡儘管為期不短，但自有文明以來則並不太長，不同種類的宗教信仰，例如超自然主義、萬物有靈論、有神論（多神或單神）等等，在社會不斷前進的道路上一直相伴相隨（Robertson, 1987）。太遠古的歷史因不是本文討論焦點且不說，若只集中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歐美西方社會與中國社會在信仰上的差異，則不難發現歐美西方社會所信仰單神論的基督宗教，與奉儒家思想為圭臬的中國實在截然不同——雖然包括一代社會學巨匠韋伯（Max Weber）在內的不少西方人，均誤稱儒家思想為宗教。

一個不可不知的現象是，相對於自然主義、萬物有靈論或多

神論者，單神論者擁有一套更令人信服的宗教理論，對諸如人的來歷，受苦和死亡這樣的塵世間存在的重大問題，作出使人感情上得到滿足的解釋。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信仰具有一種只有自己信仰的神，才是世界上唯一真神的特點。由此衍生出來的，是認定其他信仰均屬異端，所崇拜的只是偶像，並會採取積極傳教、爭取信徒，勸人皈依，脫離信仰那些被視為異端、偶像的信仰。更具歷史發展關鍵的問題是，率先走向現代化的歐西國家，基本上均屬信奉單神論，當他們憑着其船堅炮利向全球拓殖擴張時，其宗教信仰自然亦在傳教士們四出傳道的努力下在全球每個角落傳播開去。

一個眾所周知的現實是，與歐西殖民地擴張者並肩前進的傳教士，總會持着一種向被統治人民傳授基督教文明是「白人的責任」觀念，並會在殖民地定居下來展開連串興建教堂、傳播福音的工作（Latourette, 1937-1947）。這些傳教士無疑是誠心誠意的。然而，他們努力的效果，卻常常因為文化和信仰差異產生了破壞傳統，動搖原來部落的社會結構和風俗習慣（如配偶制度）等問題，至於引進了西方重視勞動以種累財富、推遲享樂及強調個人自由等價值標準，雖有幫助這些民族擺脫傳統制度桎梏、改善生活水平的一面，但亦有明顯讓他們變成為殖民地主幹活，受到更嚴重剝削的另一面（蘇精，2005）。

儘管歐西國家不少人誤把儒家思想視作宗教，但他們對儒家思想具包容性、不排斥其他信仰的特點十分了解，加上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問題，屬於龐大的「信仰市場」，所以一直渴望把他們的宗教傳到中國。事實上，早在唐初之時，景教（即東方教會，屬於基督宗教的一個分派）已傳入，但因其與儒家信奉祖先崇拜的核心

相逆，所以信仰者一直很少。就算經歷宋元兩朝，亦未見流行。到了明代，有天主教傳教士雖改穿華服，並以華語傳教，甚至不惜藉結識士大夫及朝廷官員，以及介紹天文科學等知識傳教，但仍是效果不彰，尤其沒法如其預期般能夠大面積地傳播開去。

在儒學大師梁漱溟（1963）眼中，中國人重視團體生活多於個人生活，文化早熟，以道德代替宗教，所以沒有熱切追求宗教信仰與皈依的心態。事實上，儒家思想有別於宗教，思想中既沒單神論的內涵，亦對鬼神不置可否，重視血脈與強調祖先崇拜，渴望後代能將自己永遠記住，並會時常祭祀他們，這種信仰的特點是令他們能對不幸和死亡處之泰然，所以不需尋求其他信仰的慰藉，單神論宗教尤其難在中華大地流行或普及起來。

當歐西國家已經崛起成為世界霸主，主導了全球秩序，山川河流的地理阻隔又已被完全克服，像中國這樣被視為屬於人口眾多的「未開化民族」，人民全屬「異教徒」，自然成為「必爭之地」（蘇精，2005）。用今天市場學的術語說，中國的信仰「市場」無疑極為龐大，人民基本上尚未有堅定的信仰，可以說是具有極為巨大的潛能，有待全面發掘開拓。

雖然早在十六世紀中葉天主教會已立足澳門，向中華大地傳播宗教，但一直規模有限、信眾不多。到了十九世紀，早已取代其他歐洲霸權成為世界霸主的英國，自然渴望把他們的福音傳到中國，其中以「在異教徒與其他未開化民族中傳布基督教」為目的的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便把他們的傳教目光投到了中國那個人口全球最多的國家（蘇精，2005：5）。可是，當他們在中華

大地傳教時，卻遭遇了滿清政府諸多嚴格限制，令他們舉步維艱，無從發揮。

相對於國力衰弱的葡萄牙，國力如日方中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無疑無法接受傳教貿易等行為受到嚴格限制，尤其在乾隆和嘉慶兩朝不同層面接觸後，了解到滿清皇朝國防力量的虛有其表，所以對於滿清當時種種遏抑他們在華活動的法規，自然表現得憤怒不滿、不能接受，在明在暗間向該國政府建議或要求採取強硬手段打開中國國門，讓其可以落實他們的目標，實在不難想像。

然而，就算是打開中國國門，甚至侵佔了中國領土，開闢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租界），並可如入無人之境般自由傳教後，由於文化差異仍在，傳統習俗未改，傳教工作依然並沒如某些傳教士的想像般容易，哪怕無論教會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府投入了龐大資源，亦做了大量修橋築路、興辦教育及救苦扶弱工作，歐西國家更有無數先進科技和「摩登」事物，卻因為「文化早熟」、「理性早啟」之故（梁漱溟，1963），加上那種秉承祖先崇拜與念記祖先祭祀的傳統，歐西國家想將中華大地的百姓改為他們的信徒，始終還是困難重重，挑戰不少。

由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變遷

人類社會由傳說時期走向有文字記錄時期，然後又進入傳統舊社會，之後在科技發明與思想啟蒙等過程中走向現代社會，並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入全球化，生活空間由只限於一隅逐步擴大，因